

铜梁商会史话

朱 绣

商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历史还得从它的前身——行帮、行会说起。据有关史料载，中国的行会起源很早，是封建社会中兴时期，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保护本行业及其成员利益而建立的同业组织，有共同崇奉的神祇，带有迷信色彩。隋唐时（公元六世纪始），城市中就有行，行有“行头”（或行首），承应官府差徭，主持同行业内部事务。比欧洲的行会起源早三百年（欧洲的行会称“基尔特”，起源于九世纪中叶）。宋代称团行，《梦梁录》团行条云：“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团行按行业分别组成，大凡官府所需之物货人工，皆取给于各团行，谓之“行户祇应”。明清行帮组织常由同乡或同业组成，或称会馆，或称公所。鸦片战争后，行帮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崛起的民族工商业遂逐渐衰落。至清末，在沿海通商口岸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开始设立商会，以后遍及全国。行帮、行会则随之而改组为同业公会，隶辖于商会。民国时期，旧政府颁布了《商会法》，商会正式成为政府承认的合法民间团体。

一、铜梁行帮、行会的情况

铜梁的行帮、行会由于受地域、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发展较晚。至清末，全县计有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行帮八个（未发现纯商业性质的行帮），在这些行帮内，由同业公推

帮董或会首，均有其共同信奉的神灵。它的任务是调解会员间的争议，交流行业信息，代会员向官府办理和交涉有关税务、工商管理等事务，共同抵御恶势力的侵扰和迫害，维护本行业及其成员的利益。

（一）屠宰帮。也叫张爷会。其主要成员为屠商，据说张飞曾以杀猪、卖肉为业，故他们供奉的祖师爷为张飞。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为张飞生日，同行业人员于是日到张爷庙（现人民法院）进行祭祀聚会。后来每年即以此地作为屠宰帮长期聚会之所。据1947年统计，当时巴川镇已有屠商84户之多。

（二）宴熟帮。也叫詹皇帮。其成员为厨工及宴熟业经营者，供奉汉朝皇宫的詹厨子（又称詹皇大帝）为祖师。铜梁巴川镇原城隍庙（现川剧团）内左侧塑有詹皇神像，每年九月十三日，宴熟帮同业人员到城隍庙祭祀。

（三）理发帮。也叫罗祖会。其成员为理发工人，据传北京白云观里有一位从南方来的罗道士理发技艺高超，曾为清世宗雍正皇帝理发，颇得雍正皇帝欢心。并以其技艺传授给民间，故理发业供奉道士“罗祖”为祖师。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停业一天，在川主庙（现县府招待所）举办罗祖会，进行祭祀。

（四）染帮。又叫梅葛二仙会。供奉梅仙，（传说中会制彩锦的人），葛仙（葛洪公元284年——364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江苏省丹阳句容人）为祖师。每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在小南街南华宫（今巴川一小对面）举办梅葛二仙会。

（五）五金帮。也叫老君会。其成员为五金业工匠，传

说老君用八卦炉炼金丹，故五金帮的尊李老君为祖师。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老君生日，同业人员去东门外玉皇庙（现水电供应站）拜祭，并请道士念经追祭办会一天。

（六）红白纸帮。又叫蔡伦、文昌会。蔡伦发明造纸术，后世尊为造纸业的祖师。文昌又名“文曲星”，传说中主宰功名之神，读书与纸张有关，故同时受读书人和造纸业同人所崇奉。巴川镇红白纸业，于每年农历四月十日在火神庙（现巴川二小）举办纪念蔡伦的祭祀活动；农历二月初二日前往文昌宫（现烈士馆）举办祭祀文昌的活动。

（七）织布帮。也叫机仙会。成员多为自织自售土布业的手工业者，据传机仙圣母是织布帮（土布）的先师，故其供奉的祖师爷为机仙圣母。会址设在小街五号，内设有机仙圣母神位，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同业人员到会祭祀。

（八）酒帮。也叫杜康帮。传说杜康是酿酒的发明者，故后世酿酒业尊杜康为祖师。巴川镇酒帮，于每年农历三月初十日在城隍庙举办杜康会，同业人员在饭馆聚餐一次，以示崇敬。

以上八个行帮均各自独立活动，各有其帮规帮禁，互不干扰。我县的行帮、行会，在封建社会中起过保护自身发展的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衰落，为商会所取代。

二、商会的建立与组织概况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闭

关自守的大门。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侵略。民族工商业者，为了振兴实业，抵制外商的垄断和掠夺，深感自己有成立商会的必要。光绪二十年（1894年）蜀人赵资生在上海成立了“蜀商公会”，和洋商进行内外贸易。1900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成立农工商部（省设劝业道、洋务局、农政局），允许工商业界成立工商会。此后，商会便在全国各地建立。

铜梁县解放前建有安居、铜梁、平滩三个商会，其中安居商会建立最早。据《新修铜梁县志》载：安居商会于宣统元年，由当地绅商周琴轩等倡率成立，呈四川劝业道准予备案，并颁发铃记一颗，设会长一人，共辖二十七个帮。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组拟定章程，另颁铃记，会长改为主席。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又改主席为理事长，改铃记为图记。其组织概况由各同业公会举派二人或三人为会员代表，计有四十二人，选理事十一人，监事五人，复由理事中选常务理事三人，互选一人为理事长。

民国七年至十六年，任安居商会会长的有：周鸿举、肖竹勋、谢宗文；民国十八年至三十年任安居商会常务主席的有：周亚韩、肖鲁瞻、吴绍周、周治东；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任安居商会理事长的有：汤春云、练文卿、吴亚东、汤砚耕、朱纯修、吴绍圃。

铜梁商会成立于民国四年（1915年）。据《新修铜梁县志》记载：清宣统时，政府以安居已有商会，只设铜梁商务公所，本县人刘伟章、张佐卿等力争，涉讼累年，民国四年得重庆商会之助，乃呈准备案，成立县商会，以南街机仙会（现烟酒二店）所捐街房一间为会址。民国七年（19

18年)一月,农商部颁发:“铜梁商会之铃记”一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新商会法》颁布后,改为主席制,设主席一人及常务、执行、监察委员等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人民团体组织法》公布后,改主席制为理、监事制,设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监事等职,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民国四年至十八年,担任铜梁县商会会长的有:刘凤梧、官炳章、张汝弼、罗锡之、周北吕、郭礼安、刘天伟、谢范程;副会长的有:王维舟、周耿光、刘筱玉。民国十九年至三十一年担任铜梁县商会主席的有:刘春辉、雷筱龙。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担任铜梁县商会理事长的有:冷雪樵、雷筱龙、魏鸿模。

平滩镇商会成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据《新修铜梁县志》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成立,二十二年(1933年)经实业部批准在案,二十三年(1934年)颁发铃记。由各帮集资购买街房三座,每年收取地租充作经费。长其事者为曹仲渊、周绍堂等。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担任平滩商会主席的有:周绍堂、王涌泉。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担任平滩商会理事长的有:吴光宇、周克配。

安居、铜梁、平滩三个商会下面辖属若干同业公会。原来的行帮都并入相应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不同于以前的各种行帮,行帮是各行业自发组织起来的,而同业公会则是经过政府批准的合法组织。据查证,安居、铜梁、平滩三个商会管辖有以下同业公会:

安居镇商会所辖的同业公会有:花纱、绸布、染织、文

具、糖食、酒业、屠业、馆业、煤炭业、粮食、油业、盐业、烟业、国药、山货、生丝、棕业、民船等十八个商业同业公会。

铜梁商会辖属同业公会有：苏货（百货）、土布、丝毛呢绒、花纱、食糖干果、文具、宴熟、屠宰、旅栈、理发、酒、茶、盐、油、磨面、水果、筒纸、丝叶烟、运输等十九个商业同业公会。

还有：电料、卷烟、五金、照相、酱园、蔬菜、煤炭等，由于人数不多故未成立同业公会。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根据《商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规定，凡同业已满七家，向商会申请加入为会员，不满七家以商店名称向商会申请登记为商会会员。

平滩镇商会辖属的同业公会有：棉纱、栈商、白布、药商、染商、丝烟、杂货、粮食、酒商、粉面、屠商、油商、茶商、猪鬃皮毛山货等十四个商业同业公会。

（一）商会的任务和职能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商会法》规定：“商会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为宗旨”。它的任务与职能是：1．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2．关于工商业之征询通报事项；3．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4．关于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5．关于工商业之证明、鉴定事项；6．关于工商业的统计、调查与编纂事项；7．设办商品陈列所，商业学校或其他关于工商业之公共事业，但须经主管官署之核准；8．遇有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政府维持之责任。

（二）同业公会的任务和职能

商业同业公会为商会的辖属单位，不同行业各自组织成的同业公会，在法律上为法人，参加商会为会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国民政府公布《商业同业公会法》第一条规定：“商业同业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为宗旨”。同业公会的职能和任务是：1．关于会员商品之共同购入保管运输广告及其他必要措施；2．关于会员营业之统制；3．关于会员营业及指导研究调查统计；4．拟定同业运用之会计制度及共同研究各种问题；5．办理当地政府及商会委办之事项；6．举办同业劳工教育及公益事项。

三、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

（一）工商联的筹建与发展变化情况

解放后，铜梁商会、安居商会及平滩商会，都为人民政府接管。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铜梁县经济，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决定筹建全县性的工商业联合会。1950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由刘国华、周仿溪、汤砚耕为正副主任委员。当时，筹委会委员四十一人。常委十五人。办事机构设秘书和正理、财务、调解、调研四个委员会。1951年5月第二次筹委会决定，秘书以下设总务、调研两个股，另设立辅导、调解学习三个委员会。1951年12月，召开第三次筹委会，选刘国华、阮扬中、张湘泉为正副主任。1952年6月召开第四次筹委会，修改了章程，又对筹委会进行了改组，筹委会由四十一人减为二十四人，常委十五人减为九

人，选阮扬中、周定介、巫相泉为正副主委。办事机构设秘书、组织、宣传、业务辅导四个股，区设分会，乡设支会。

筹委会的任务是：1. 筹组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2. 整顿和改造全县私营工商业；3. 协助推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完成政府布置的任务；4. 反映工商业的实际情况和意见，提供政府作施政决策之参考；5. 属于全县急需兴办之工商业，拟订具体计划，建议政府采择施行；6. 在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本筹委会为全县工商业者的统一领导机构，协调各分会和小组之间相互关系。

1954年3月，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选魏鸿模为主任、张建华、陈行道、姚长清、石国森为副主任，选常委九人，执委三十四人。

1957年3月，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魏鸿模继任主任，张敬宇、陈行道、李燧昌、姚长清的副主任，选常委九人，执委四十九人。到1958年4月，由于魏鸿模被错化为右派分子撤销主任职务，经第二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推选李燧昌为代主任。

1962年2月，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李燧昌为主任，郭远达、姚长清、石荣华、蒋紫云、苏其英为副主任，选常委十五人，执委四十九人。

1964年4月，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李燧昌继任主任，孙礼、石荣华、苏其英、蒋紫云、姚长清为副主任，选常委十五人，执委四十九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联的办事地点被“造反派”占据，工商联机关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县革委成立后，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有的被调走，留下的同志

被抽调搞其他工作，没有开展会务活动。直到1985年才经县委批准同意恢复工商联组织，并由政协牵头，组织原工商联有关人员成立了工商联筹备组，对全县工商联会员进行了登记，处理日常事务，为正式恢复工商联，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打下了基础。1989年5月18日至19日，召开了铜梁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余云嘉为工商联主任，朱明华、周承永、陈举芳、石荣华为副主任，常委十三人，执委三十三人。

（二）工商联的性质与任务

工商联成立以来，其性质和任务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百四十七次政务会议公布施行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联是包括国营企业的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各行各业同业公会为工商联的专业机构。这样，就把全县各工商业户纳入了各行各业公会，都成为工商联的会员。1953年以前全县会员达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二人，工商联就成为政府同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商联实际上成了主要由原工商业者组成的，以自我教育为主要职能的人民团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十年“文化大革命”。

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全国工商联修订了章程，明确规定“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主要由工商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组成”。

1988年中共中央指出：工商联是统一战线组织和民间商会两者相结合的性质。这个性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统战性、民间性和经济性的统一。

工商联的任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商联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四面八方”政策。一方面教育全县工商业者遵循“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同时，在贷款、货源等方面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方面协助政府搞好税收、推销公债，为国家积累资金。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向广大工商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工商界捐献资金，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活动。

国家进入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党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联一方面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和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宪法和有关方针政策，加强爱国守法教育；一方面辅导和推动私营工商业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实行公私合营，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完成了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联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贯彻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企业或者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三以”方针，服务与学习“两条腿走路”。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改造思想和世界观。

1985年，铜梁县工商联恢复组织并开展活动后，认真贯彻执行了全国工商联提出的：团结所有成员及其所联系的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9年5月，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健全了组织，它的任务是认真贯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提出的“团结工商业界，在国家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开展对外经济联系合作和友好往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为把铜梁县工商业联合会建设成为对内对外的民间商会而努力。

辛亥革命期间铜梁的民主革命活动概略

姚肇煊 吴家骧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从此，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确立了共和制。铜梁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革命活动中，出现了很多仁人志士，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就有关史料，整理记述如下：

铜梁同盟会员的活动

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下，灾难日益深重。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一次又一次地出卖国家主权，激发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在这种危及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紧急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应运而生，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有许多热血青年，乘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机会，投奔到日本等国去留学，寻求复兴中华的真谛和出路。

一九〇五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在日本留学的四川青

年，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同盟会。铜梁在日本留学的杨霖、冷南轩(天才)、刘赓唐、彭仿陶等就首批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在国内，铜梁的陈达三于一九〇六年在直隶省(今河北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也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是年，孙中山又派四川的童宪章、熊克武、黄复生等回川发展“同盟会员”建立组织。铜梁在重庆府中读书的郭汝栋、李吉康等也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其组织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些铜梁籍的同盟会员主动与省内外和本县的有关人士联络，积极鼓吹革命。一九〇八年由保定回川的陈达三在任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教官和在新军任职时，即与同盟会的骨干吴玉章、杨庶堪、张培爵、夏之时等密切联系，共同策应四川的地方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由日本留学回川的铜梁人周正寰与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川任川东师范校校长的杨霖同谋革命。杨霖托周正寰回铜梁做本县上层人士的反正工作。周回县后，即同已参加同盟会的彭泽久和在四川法政学堂毕业回县的彭选三、铜梁城防司令周克山、县议员练哲谔、县高等官办小学校长刘鸿来等，开展了革命活动和策划反正的工作。周正寰在铜梁演说时，历数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演说时声泪俱下，闻者动容，从者甚众。在同盟会员和拥护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志士仁人活动下，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权做好了思想准备。

铜梁保路同志分会的斗争

波澜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奏，四川的保路风潮，牵制了清廷的精力和军事力量，促使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说：“若没有四川保路

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拟办的铁路，路线计划从四川省成都经重庆至湖北的汉口。一九〇三年在四川成立商办“川汉铁路公司”。一九〇四年改为“官商合办”，一九〇七年又改为“商办”。于是，川汉铁路公司聘请了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并于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川汉铁路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租股”即抽租的办法，采取随粮征集，一般为值百抽三；还有百货厘金股等，四川的“肩担背负之夫”也曾入股。这样，不仅绅、商、地主成为铁路的股东，广大劳动群众也握有股票。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推行“借款夺路”的侵略扩张阴谋面前，不但不抵制，反而打着“铁路国有”的旗号出卖铁路主权以博得洋人的欢心。竟于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悍然宣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五月十八日，又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管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五月二十日清政府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集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条约”，将粤汉、川汉铁路主权卖给了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四川省人民的公愤，保路运动，先由湖南兴起，四川尤为激烈。

一九一一年六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代表开会。铜梁公推周克山代表铜梁川汉铁路商股出席。这次集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选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痛斥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川人民“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保路同志会纷纷成立。重庆于六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铜梁也于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了保路同志分会，选出熊亚

春为分会长，周克山、彭选三、彭用九、夏鼐卿、杨登九等士绅参加了领导，号召全县各界人民起来“破约保路”。到九月，铜梁县城和各主要场、镇都组织起了保路同志军。铜梁保路同志军的领队为叶秀山。立即声援全川的保路运动，响应成都八月的罢市、罢课，九月的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担负外债分厘”的号召。铜梁和大足千余家纸厂联合，开展了罢工，罢市，不纳捐债的斗争。当川督赵尔丰制造了对请愿群众的“成都血案”后，更加激怒了全川人民。铜梁的彭选三、夏鼐卿、龚夕周、彭宪章、张炳清等揭竿而起，组成大庙镇的保路同志军，向县城进发，拟经潼南西上去成都声援。后闻清庭派出的端方已被杀于资中，川督赵尔丰亦被杀于成都，乃止。十月五日，铜梁保路同志分会以本县东、西山煤厂、纸厂的工人为主体的同志军队伍曾聚集县城，手持“保护铁路，争取路权，推翻清王朝，逆吾者死”的标语，打着灯笼，扛起大刀、长矛等军械，在县城汇成了一支大规模的同志军队伍，进行示威游行，以声援全川保路反清的斗争，并积极开展对铜梁县知事唐绍皋的反正工作。

铜梁军政府的成立

一九一一年十月初，四川的保路运动达到高潮，各地纷纷掀起反清的武装起义。铜梁的保路同志军，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乘清政府端方从湖北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兵力空虚之机，及时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极大地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十一月五日，同盟会员夏之时在龙泉驿策

动新军起义，然后回师东下，扼守重庆浮图关。十一月二十二日，同盟会在重庆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督都，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川东南五十七州、县闻风响应，接受重庆蜀军政府的领导。重庆蜀军政府铜梁人杨霖、彭泽久、刘济康、郭汝栋等均参与了起义斗争和蜀军政府的工作，极大地鼓舞了铜梁人民。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周克山等人的领导下，迫使清政府在铜梁的县知事唐绍皋交出了县印五颗（一县、二局、三学、四汛、五辅）后，悄然离去。就这样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清王朝在铜梁的统治。同日，铜梁军政府成立。公推周克山为司令官，张煜（蓬甫）为副司令官，刘天纬（毓灵）为军政长，周正寰（懋岩）为行政长、练哲谔为民政长，吴大猷（子俊）为司法长，李景纲（辅周）为财政长，夏肅卿为外交长，刘鸿来任视学兼中学校长，彭选三任案牍课长，刘凤梧辅助军政府等。革去宣统年号，改称黄帝纪年4609年。铜梁军政府成立后，在重庆蜀军政府的领导下，对全县的军事、民事均处理周至，四境安然。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改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铜梁奉令改司令官为县知事，改县署为行政公署。旋由重庆蜀军政府派赵庆光接任县知事。三月，重庆、成都蜀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宣告四川统一。又由四川军政府委任尚怀孝为铜梁县知事。至此，铜梁的同盟会员，保路同志分会的同志军和仁人志士们完成了响应和参与辛亥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

回顾辛亥革命历史，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对于今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有深刻意义的。

我们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祖国的统一，为早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九日